中国古籍修复可识别原则、技术及其应用

■ 王国强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郑州 450001

摘　要：[目的/意义]中国古籍修复应遵守可识别原则，以保持古籍原件的客观真实，恪守古籍修复伦理，中国古籍修复需要确认合理的可识别技术。[方法/过程]通过归纳方法总结中国古籍修复技术的可识别标识，利用中国古籍修复技术修复案例提供的可识别效果，证明中国古籍修复技术具有可识别功能。[结果/结论]中国古籍修复技术符合修复可识别原则，集修复与可识别功能于一体，具有良好的可识别性，符合中国古籍特点。应用可识别技术应随古籍形态及其修复目的而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关键词：古籍修复　古籍修复技术　可识别原则　可识别技术　古籍修复原则
分类号：G264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0.06.005

可识别原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物修复基本原则之一，是文物修复理念的重大进步，已在国际范围内各类文物修复中得到普遍应用，可识别技术也多种多样[1]。中国古籍修复可识别原则的提出，与中国古籍修复理念和修复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在继承中国传统古籍修复技艺、借鉴西方古籍修复技术和创新古籍修复技术的基础上，中国古籍修复技术种类多样，安全有效，已经初步形成体系，并且制订了一些修复技术标准，标志着中国古籍修复技术已从经验性技术阶段走向经验性技术和科学性技术并存阶段，古籍修复学科呼之欲出[2]。但是中国古籍修复技术在科学性、规范性和系统性方面还有所欠缺，在应用方面也缺乏明确的修复原则的指导。古籍修复原则规定了正当和合理的修复技术，决定着修复技术的发展路径，指导着修复技术的选择和实施，逐渐引起古籍修复学界的关注。1991年，国家图书馆在制订修复敦煌遗书方案时要求裱补纸与原卷有明显的差别[3]，最早明确表示了古籍修复应用可识别原则。此后多种古籍修复案例都表明应用了可识别原则。2000年，马海鹏提出文献修复若干原则，却没有包括可识别原则，但是接着他又强调文献修复部位要与原件协调又要有一定区别，“粗看无异、细辨有别”[4]，这是我国首次关于古籍修复可识别的理论阐释；2007年，杜伟生专文讨论古籍修复原则，始把可识别原则作为古籍修复的原则之一，认为修复材料应与古籍的颜色协调但应有区别，酌情保留前人修复的信息[5]，其后曹晋[6]、张美芳[7]和赵小尊[8]等都认同古籍修复可识别原则并有所阐述，但是都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讨论。迄今为止，中国古籍修复界并没有明确提出或规定某种（些）古籍修复可识别技术作为普适性古籍修复可识别技术予以讨论或推广。

古籍修复可识别问题涉及古籍真实性、古籍修复伦理、可识别技术及其应用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亟需学界深入探讨。但是中国是否接受和如何实现古籍修复可识别原则、是否应用古籍修复可识别技术、有无合适的古籍修复可识别技术、古籍修复技术与可识别性有无关系，目前都很少讨论，不利于中国古籍修复可识别原则和可识别技术的确立和应用，也不利于中国古籍修复理论的发展。本文拟在阐释古籍修复可识别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古籍修复技术符合可识别原则的观点，并分析中国古籍修复可识别技术的价值、应用要求及其对中国古籍修复理念和技术评价标准的启示，旨在为中国古籍修复可识别技术实践提供一些参考。

1　可识别原则的内涵及其在古籍修复中应用的原因

1.1　可识别原则的内涵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文物修复由美学修复转向

作者简介：王国强（ORCID：0000-0002-0094-7232），教授，博士后，E-mail：freewgq@zzu.edu.cn。
收稿日期：2019-07-04　修回日期：2019-09-19　本文起止页码：33-38　本文责任编辑：王传清

保持材料真实的科学修复。1963年,意大利学者布兰迪提出文物修复可识别原则:"任何整合必须总是具有容易的可识别性,但却不应为此干扰我们所希望重建出来的那种一体性,因此,在艺术作品应被观赏的距离下,应察觉不到这种整合,但稍微凑近细看时,在无需借助特殊工具的情况下,应立刻能识别出这种整合"[9]。该原则在1964年问世的《威尼斯宪章》中得到确认:第9条称"任何一点不可避免的增添部分都必须跟原来的建筑外观明显地区别开来,并且要看得出是当代的东西";第12条称"补足缺失的部分,必须保持整体的和谐,但在同时,又必须使补足的部分跟原来部分明显地区别,防止补足部分使原有的艺术和历史见证失去真实性"[10]。该原则被多种文物保护修复权威文献(包括2000年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所接受[11]。

修复可识别原则是指附加于文物之上的修复部分与原件保持整体和谐的同时能够有区别[12],具体而言,就是远观一致,近观有别。所谓远观一致,就是距离文物6呎(约1.8m)之处,肉眼看不出修复痕迹,修复部分与原件和谐一致,所谓近观有别,就是距离文物6吋(15cm)之处,肉眼可以看出修复痕迹[13]。当然,这只是大致的距离,不同种类文物的可识别标识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别。修复可识别原则的内涵大致如下:①可识别原则的目的是实现美学和史实的双重要求,最大程度地保留原件的形制、结构和风格,修复应用的材料和工艺与原件相近,保证修复部分与原件整体的和谐,实现统一的审美效果,同时使修复部分与原件区别,避免误判原件[14],但是不能因为可识别性而破坏原件整体的观赏性和完整性。②原件包括原件和原件上的修复遗留。修复遗留是文物历史印记的一部分,是文物本体的一部分,是文物的客观真实,应该受到尊重,从宏观历史的大视角看待修复。《威尼斯宪章》第11条也要求尊重前人的修复,尊重修复风格的多样化[10]。③可识别是自然光下肉眼视觉一定距离的可识别,而不是有些中国学者一直辩称的依靠科学仪器等特殊工具的可识别,因为后者有违可识别原则的本意,也无法充分体现修复师的诚信。④可识别原则需要一定的可识别技术才能实现。⑤可识别原则需要在整体中把握,不可以脱离相关文献单独诠释,以免伤害可识别原则,与其他条款或修复原则发生冲突[15]。

1.2 可识别原则在古籍修复中应用的原因

古籍是文物的一部分,具有普适性的文物修复可识别原则,也适用于古籍。古籍修复应用可识别原则是必要的:①保持古籍原件的客观真实。古籍修复关注、尊重古籍的原真性,强调维持古籍客观的真实,要求显示修复部分与原件的形态,而不是将古籍变成自身的赝品。②恪守古籍修复伦理。可识别原则强调显示修复部位,避免导致人们对古籍价值的错误判断,否则就是作伪的表现。凡是破坏文物历史真实性的修复行为都是作伪。布兰迪指出物品的虚假不以其是否等同于真品为判断的依据,而在于生产者是否有作伪的意图,即使不是意存欺骗,只要在时代、材料、厂家、作者等给人等同于真品的错觉,就是作伪[9]。文物保护修复的官方文献都强调修复师应诚实守信,杜绝作伪,古籍也不例外。

2 中国古籍修复技术符合可识别原则

中国古籍修复界没有提出具体可识别技术,但是,中国具有古籍修复可识别技术,并在古籍修复实践中应用了可识别技术,这就是中国古籍修复技术。

2.1 中国古籍修复技术具有可识别标识

中国古籍修复技术具有的符合可识别原则的可识别标识证明中国古籍修复技术符合可识别原则。中国古籍修复技术分为整旧如旧和整旧如新两类,整旧如旧是使用颜色、厚薄、纹理与原件相近的配纸,不划栏补字,修复材料与原件既和谐又有差别;整旧如新(金镶玉装)是首先利用整旧如旧技术修复破损叶面,然后在书叶背面衬纸,白色衬纸与原件黄色书叶的色彩、新旧差别较大,可识别标识明显,但是整体和谐。中国古籍修复技术提供了多种可识别标识,如色彩差别(补纸颜色略浅)、厚度差别(补纸厚度略薄)、新旧差别(修复材料新)和补纸粘贴印痕,都与原件整体和谐又有区别。可识别标识度较高的常用古籍修复技术见表1。

可识别标识度中等或较低的常用古籍修复技术见表2。

2.2 中国古籍修复技术的修复成果具有可识别效果

利用中国古籍修复技术所修复的具有可识别效果的成果,大部分符合可识别原则,这证明中国古籍修复技术符合可识别原则。古籍修复需要多次使用某种技术或同时使用多种技术,古籍修复可识别标识较多且明显。国家图书馆最早表明使用可识别技术修复古籍,在敦煌遗书[3]、《永乐大典》[5]和天禄琳琅专藏[16]修复中,采用中国古籍修复技术,强调配纸与原件的差别,天禄琳琅专藏的修复明确要求"远看看不出,近看能分辨"[16]。天一阁提出了与之相同的古籍修复可识别要求,要求采用中国古籍修复技术修复古籍,修复材

王国强. 中国古籍修复可识别原则、技术及其应用[J]. 图书情报工作,2020,64(6):33－38.

表1 可识别标识度较高的古籍修复技术

修复项目	修复技术	可识别标识
金镶玉	在线装、包背装和蝴蝶装古籍书叶背后加白色衬纸装修	天头地脚及书背三面都是白色衬纸
裱书	将比书叶四周稍大的薄纸粘贴在糟朽、焦脆的书叶背面	使书叶变厚变硬,修裱纸与原件纸颜色、质地和厚薄有差别
加固局部	用纸在焦脆、霉变的书叶背后加固一层,防止掉落	使书叶变厚变硬,加固用纸与原件纸颜色、质地和厚薄有差别
衬纸	在书叶背面垫纸加固	衬纸与原件纸颜色、质地不同
接书背	用比原件纸颜色浅淡、厚度略薄的配纸将过窄的书脑接宽	配纸比原件纸颜色浅淡,厚度略薄,书背的衬纸或拼接的印记
接补四周短小的书叶	用比原件纸颜色浅淡、厚度略薄的配纸镶结短小的书叶	配纸比原件纸颜色浅淡、厚度略薄,有镶接方法的印记,或书脑后留有明显的纸茬
修补两面有字的书叶	将书叶分揭成两个单叶裱补,两单叶粘合成一叶或在背面衬纸	两张单叶合成一叶的粘贴印记,书叶背面的衬纸
溜口	用比原件纸颜色浅淡、厚度略薄的配纸把裂开的书口粘成整叶	补纸比原件纸颜色略淡、厚度略薄,修补边缘的印记,书口处的薄纸条
在有栏线、文字的叶面上填补缺失	把比原件纸颜色浅淡,厚度略薄的配纸或补书机用纸浆在缺失处粘贴填充,不划栏补字	粘贴、补浆后在本该有栏线、文字处留下空白,缺栏短字,与周围文字栏线形成对比,纸浆、补纸颜色略淡,补纸略薄

表2 可识别标识度中等或较低的古籍修复技术

修复项目	修复技术	可识别标识
修补裂口、蛀洞或空白叶的缺失	用比原件纸颜色浅淡,厚度略薄的补纸修补原件纸裂口、蛀洞或空白书叶的缺失	补纸比原件纸颜色浅淡、厚度略薄,在修补边缘有印记,修补面积大小、修补材料多少和粘结痕迹大小不同,可识别度不同
修补书皮	用比原件纸颜色浅淡,厚度略薄的配纸补裱残缺的书皮	补纸比原件纸颜色浅淡、厚度略薄,粘贴边缘的印记
修补护叶	用比原件纸颜色浅淡,厚度略薄的配纸补裱残缺的护叶	补纸比原件纸颜色浅淡、厚度略薄,粘贴边缘的印记

料与原件材质、颜色近似,宁浅勿深,宁薄勿厚[17],其修复案例显示了良好的可识别效果[18]。马艺蓉在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修复中国清代刻本《唐诗合解》时,以中国古籍修复技术为基础,用经过橡碗子染色、颜色和厚度接近于原件的日本楮皮纸为补纸,不划栏补字,补纸与原件色调和质感既协调统一又有一定区别,却不造成过度反差而伤害原件的历史感和美感,又不试图作伪[19]。利用中国古籍修复技术修复的绝大多数古籍,并没有表示应用可识别技术,但具有可识别效果。不过,一些具有可识别效果的古籍修复成品可能缺乏整体和谐,并不符合可识别原则,这是因为中国古籍修复技术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或没有得到正确使用。

绝对不可识别的修复是不存在的[20],有学者认为中国文物修复技术具有可识别性,"可以被纳入可辨识的范围"[21]。有人指出,"如果配纸适当,修补后的书叶,不易看出破烂的痕迹,反之,如果配纸不适当,即使有高明的技术,经过精工细作,也难协调一致"[22],可见中国古籍修复界也知道中国古籍修复技术客观上能够达到整体和谐而又可以看出修复痕迹,但是修复师更乐意追求可望而不可即的补处莫分、浑然一体的古籍修复理念而不是可识别理念,也不愿认同可识别理念。中国古籍修复界一直应用着符合可识别原则的古籍修复技术,却没有把它与可识别原则和技术联系起来,没有提出中国古籍修复技术符合可识别原则或中国古籍修复技术是可识别技术的观点。提出这个观点,应该可以明确中国古籍修复可识别技术。

西方用符合可识别原则的古籍修复技术修复古籍为中国古籍修复技术符合可识别原则提供了旁证。西方的古籍修复遵循可识别原则,即使使用很小的碎片替代原件或填补缺失部分都不与原件混淆,肉眼能够分辨[23]。西方应用古籍修复技术,修复部位与原件整体保持和谐同时有一定区别,并未使用其他特殊的可识别技术。西方古籍修复可识别主要体现在两方面:①补纸的颜色和质地与原件纸有区别,西方古籍修复使用的补纸是日本薄纸,其颜色与古籍原件纸相近但略浅,厚度较原件薄,存在明显差别[24];②有轻淡的修补痕迹,古籍修补痕迹用肉眼可识别,但无明显的视觉差别[25]。

3 中国古籍修复可识别技术的价值

3.1 集修复与可识别功能于一体

中国古籍修复技术在修复材料、修复方式、修复部位等方面的可识别效果是在古籍修复过程中依靠修复技术本身实现的,既没有因为显示可识别标识而增加或改变修复的材料、方法和工序,刻意突出修复部位,也没有增加可识别的特殊材料和工序而提高古籍修复成本,避免了为识别而识别,而且符合可识别原则,是最经济的可识别技术,遵循了最小干预原则和可逆性原则。中国古籍修复可识别技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修复可识别技术,是集古籍修复与可识别功能于一体的

技术,即在完成修复工作的同时实现了可识别。

3.2 具有良好的可识别性

中国古籍修复技术的可识别性具有诸多技术优势:①可识别标识程度较高。各项修复技术都有一定的可识别标识,这些标识都会通过修复材料、修复方法而留存在修复后的古籍中,至于遗留的具体部位并不重要。②识别方便。修复痕迹依靠肉眼可以看到,不需要借助专门设备。中国古籍修复的"微相入"法(补纸边缘纤维与古籍书叶破损边缘微搭),修补痕迹最小,但在光亮下依靠肉眼仍然无所遁形[26]。③识别材料持久。修复配纸是酸度较低的手工纸,寿命达数百年。④识别效果长期。古籍材料、修复材料受外界的影响会发生变化,增加或降低可识别标识程度。旧纸、染纸和定制专用仿纸等修复配纸颜色较稳定,但会逐渐加深,原件纸颜色也会进一步加深,两者并不同步,而补纸和原件纸的质地不会变化,所以可识别效果期限较长。

3.3 适应中国古籍特点

修复可识别技术需要适应文物的特点,尤其是文物的形制和体积。与其他文物相比,古籍在物的层面上为二维平面,体积小,色彩单一,纸面及其内容会褪色、碎裂。中国古籍的特点是纸张轻薄而质软,单面书写,装帧形式多样而结构简单,历经岁月洗礼,纸张泛黄,古韵沧桑,这需要相应的修复可识别技术。中国古籍修复技术能够实现补纸与原件纸的材质、纹理、厚度及色彩相似的效果,没有过于生硬的对比和强烈的反差,各修复部位与古籍原件之间共同构成一个和谐而有区别的整体,适应中国古籍特点。

3.4 弘扬中国古籍修复技术文化

中国创造了丰富多姿的古籍修复技术文化,中国古籍修复可识别技术可以弘扬中国古籍修复技术文化:①可以保持古籍修复技术文化的内涵。中国古籍修复技术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长的,是适应古籍的特点产生和发展的,是古籍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这些内涵只有不断传承、发展,才能保持和延续。②可以传承中国古籍修复技术。古籍修复技术凝聚着历代修复工匠、科学家和文人的心血,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中国古籍修复可识别技术能够保证中国古籍修复技术的使用,保护并传承古籍修复技术,避免其弃置和退化。③保持中国修复古籍的特有效果和风格。中国古籍修复技术追求古籍的整体协调,追求整体美感,符合中国审美观念。

4 中国古籍修复可识别技术的应用要求

4.1 可识别技术随古籍形态而定

不同类型的文物修复使用的可识别技术是不同的。《威尼斯宪章》和其他文件没有给出可识别技术的具体标准,这为可识别技术的应用留下了不确定性。由于制作材料、制作技术、流传年代和流传环境不同,每部古籍的形态都不相同;同一册古籍,前后与中间也有差别,甚至同一张书叶,四周和中间部分也有不同。这决定了古籍可识别技术没有固定的程式和规则,应随古籍形态而定,即根据每册古籍的实际情况而定,使修复痕迹与原件整体协调,符合可识别原则。修复师更应匠心独运,灵活处理细节,如古籍书叶颜色以均匀单一为主,但蛀洞周边的颜色有随机且复杂的变化,书叶颜色也由边缘向中间逐渐变浅,染纸时不必刻意追求颜色的均匀[27],只需保持修复部分与原件的整体和谐同时有所区别。

4.2 可识别标识度的高低依古籍修复目的而定

修复可识别标识度的高低,即修复部分与原件差别的程度,不同文献有不同的表述,没有明确的一致的量化指标,如《威尼斯宪章》要求明显的区别[10],加拿大则要求"外观上不需要非常明显"[28]。由于古籍修复技术和可识别技术的一体性,所以可识别标识程度高低与修复材料的多少、修复面积的大小有关。不同古籍需要的可识别标识程度不尽相同,可以依据修复目的而定,需要灵活运用。考古修复的古籍,重要的是最小干预,突出古籍的原真性,要求的可识别标识度较高;美学修复的古籍,美学价值是追求的主要目标,更需要讲究古籍整体的和谐,要求的可识别标识度最低;展览修复的古籍,就要考虑展览的环境、放置的位置、光线及与观众的距离等因素,观众看到的部位,可识别标识度可略低,观众看不到的部位,可识别标识度可略高。

4.3 可识别技术不干扰古籍原件整体和谐

有些文物修复可识别技术,如古建修复的留白(不经油饰或只上清漆),或者用与原件质地、颜色差别很大的材料,造成修补部分过于突出,孤立于整体之外,与整体并不协调,这是为识别而识别,是对可识别原则缺乏准确的理解。可识别原则要求修复部分不能干扰原件整体的和谐。古籍面积和体积小,色彩均匀而单一,而且也是近距离翻阅、欣赏,修复部位较易辨别,可识别标识程度应适宜,材料的质地、色彩不宜与原件反差过大,修补痕迹不宜太明显、太强烈,避免以可识别

为由刻意加大修复部分与原件的反差,与古籍整体材料和色彩形成冲突,损伤古籍整体的和谐之美,"干扰我们所希望重建出来的那种一体性"[9]。

4.4 结合其他可识别技术使用

除了利用中国古籍修复技术作为直接性可识别技术,还可以利用辅助性可识别技术,如在补纸粘贴边缘用铅笔描绘出轮廓显示修复部位,以作为某些可识别标识度过低的技术的辅助。

4.4.1 修复题跋也是可识别技术

修复题跋可以题写在古籍中,如敦煌卷子中道真的题跋[29],也可以写在纸条上粘贴在古籍中,如南京图书馆藏宋刻《蟠室老人文集》护叶中间下方粘贴的赵万里题写的"一九五九年一月张士达装"纸条[30],这种方法适合一些杰出修复师的作品。经典的修复题跋是清代黄丕烈题写在《重雕足本鉴诫录》中的:"此书向为天籁阁旧装,所补纸皆白色不纯者,故项氏图章及阮亭先生校改朱笔皆在白纸上。余今为之重装,悉以宋纸补之,取其色纯也。于图章及校改朱笔,仍留其白纸痕,所以传信于后。"[31]这则题跋留下了大量修复信息:该书曾由明代项元汴以白纸修复过,黄氏再修复时以宋纸代替白纸。

4.4.2 古籍本体外的可识别技术

即建立古籍修复档案。修复档案可以提供全面具体的修复信息,如古籍的基本信息、现状信息、历史修复信息、病害评估、修复技术的筛选、修复技术路线[32],有些信息是古籍物理形态的可识别所不能提供的,适用于全部修复的古籍,《威尼斯宪章》16 条正是这样规定的[10]。首先,修复档案可以永久保存修复证据。其次,修复档案既能补充古籍本体修复之外的信息,也可适当减少古籍本体上的可识别技术。

5 中国古籍修复技术符合可识别原则的思考

中国古籍修复技术符合修复可识别原则为人们反思中国古籍修复理念和中国古籍修复技术效果的评价标准带来思考。

5.1 适当调整中国古籍修复理念

理念是随着现实观念、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我们应借鉴西方远观一体、近观有别的古籍修复理念,把补处莫分、浑然一体的中国古籍修复理念调整为整体和谐、补处有别,即修复部位与原件保持整体和谐同时有所区别,其原因是:①补处莫分、浑然一体的理念要求修复后的古籍不显示修复部位,违背了可识别原则,违背了修复伦理。②补处莫分、浑然一体的理念无法实现。可识别是个相对概念,中国古籍修复技术无法做到不可识别,无法实现补处莫分、浑然一体的理念,技术及其实施与理念之间总是隔着一段距离。③补处莫分、浑然一体的理念加大了中国古籍修复的难度,提高了古籍修复的成本。整体和谐、补处有别把中国古籍修复理念和可识别原则结合在一起,既继承了中国古籍修复理念的核心内容,也符合古籍修复技术实际,符合可识别原则。

5.2 适度放宽中国古籍修复技术效果评价标准

对于中国古籍修复技术效果的评价,我们按照中国古籍修复理念,强调修复部分与原件的一致性,并以达到一致性的程度作为评判成品修复质量的主要标准。应用中国古籍修复可识别技术,以整体和谐、补处有别作为古籍修复理念,就不应再拘泥于修复部分与古籍原件的一致性,不再把修复部位与原件的适度差别视为修复质量不高的证据,而应强调相似性和可识别性,强调整体和谐和区别共存,适度放宽中国古籍修复技术效果评价标准,适度提高一些技术的可识别标识,适度放宽一些技术的要求,减少做旧处理工序,如染纸,只需染色到与原件相似,不必花费过多工序去刻意追求与原件的过度相似,这只是观念调整问题,而不是降低修复质量问题,这样修复界可以更多关注古籍修复的延年益寿的目的,节约古籍修复成本,修复更多亟需修复的古籍。

6 结语

中国古籍修复技术不仅具有修复功能,也兼有可识别功能。中国古籍修复技术都有一定的可识别标识,古籍修复实践也证明了中国古籍修复技术的可识别功能。中国古籍修复技术符合修复可识别原则,适应古籍特点,具有良好的可识别特征。中国古籍修复实际上采用了古籍修复可识别方法,客观上遵循了古籍修复可识别原则。古籍修复可识别标识程度的实现,应该根据具体古籍及其修复目的,灵活应用。应用修复可识别技术,可以对中国古籍修复理念和中国古籍修复技术效果评价标准做出适当调整,提高古籍修复速度。

参考文献:

[1] 韩玉玲,赵会军,王爱英,等. 意大利文物保护考察漫记[J]. 中原文物,2001(3):86 – 88.
[2] 张美芳. 古籍修复学科构建的若干思考[J]. 图书情报工作,

2018,62(10):5-9.
[3] 方广锠.《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前言[J]. 文献,1999(4):8-24.
[4] 马海鹏. 论文献修复原则[J]. 中国博物馆,2000(4):80-85.
[5] 杜伟生. 古籍修复原则[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07(4):79-83.
[6] 曹晋. 中、日古籍修复方法之异同——以《重修扬州府志》为例[J]. 河南图书馆学刊,2009,29(5):159-160.
[7] 张美芳,张松道. 文献遗产保护技术管理理论与实践[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8] 赵小尊,田育星. 适应未来发展的古籍修复理念及方法[J]. 陕西档案,2013 (1):47.
[9] 布兰迪. 修复理论[M]. 陆地,译.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
[10] 威尼斯宪章[EB/OL]. [2019-04-28]. http://www.doc88.com/p-002207259423.html.
[11]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EB/OL]. [2019-05-04]. https://www.taodocs.com/p-136846619.html.
[12] 陆宗润. 艺术、技艺、科学——中国书画修复理论的现代重建[J]. 中国美术,2016(5):19-22.
[13] CAPLE C. Conservation skills : judgement method and decision making[M]. Oxford: Psychology Press,2000.
[14] 李彦平. 修旧如旧的可识别性原则探索——以一面铜镜的保护与修复为例[J]. 人类文化遗产保护,2014:8-13.
[15] 张金凤,陆继财. 以"特修斯之船"的方式思辨"可识别性"——关于中国文物保护实践的一点思考[J]. 中国文化遗产,2018(3):96-103.
[16] 于思奇. 受伤古籍"天禄琳琅"的重生之路[N]. 中国科学报,2013-09-13(13).
[17] 陈青,乌莹君. 天一阁修书人:为古籍"续命"[N]. 宁波日报,2019-02-12(B4).
[18] 董捷. 从《古籍与文书修复导则》案例试析两者修复之异同[J]. 遗产与保护研究,2017, 2 (2):175-178.
[19] 马艺蓉. 意大利国家图书馆所藏一册中国清代古籍的保护修复[J].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7, 29 (3):14-22.
[20] 马炳坚. 从历代帝王庙维修保护的实践看我国文物古建筑保护修缮的特殊规律[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5):310-330,374.
[21] 贾文忠. 中国应有自己的文物修复理念[J]. 文物修复与研究,2007:364-366.
[22] 肖振棠,丁瑜. 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
[23] COPEDÉ M. Il restauro delle opera cartacee[M]. Fireze:Quaderni dell'Istituto per l'Arte e il Restauro di Palazzo Spinelli,1993.
[24] Library of Congress. Islamic partial leather rebinding of a 19th Century Persian manuscript[EB/OL]. [2019-03-30]. https://www.loc.gov/preservation/conservators/rumi/treatment.html.
[25] Library of Congress. Adjusted water washing of a 19th Century American lithograph[EB/OL]. [2019-03-30]. https://www.loc.gov/preservation/conservators/up john/treatment.html.
[26] 贾思勰. 齐民要术校释[M]. 缪启愉,校释. 缪桂龙,参校. 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
[27] 李涛. 文物保护与修复理念的沿革及对当今文物修复技艺的影响——《晚清八言联》修复实例[J]. 博物院,2018, 2(2):128-136.
[28] CAC&CAPC. Code of ethics and guidance for practice of the 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and the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Conservators[EB/OL]. [2019-01-22]. https://www.cac-accr.ca/files/pdf/ecode.pdf.
[29] 林世田,张平,赵大莹. 国家图书馆所藏与道真有关写卷古代修复浅析[J].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3):25-31.
[30] 邱晓刚. 张士达与《蟫室老人文集》[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07(4):93-94.
[31] 黄丕烈. 黄丕烈藏书题跋集[M]. 余鸣鸿,占旭东,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32] 张金萍,陈潇俐,何伟俊,等. 中国书画文物修复导则[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On Identifiable Principl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Ancient Book Conservation in China

Wang Guoqia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ncient book conservation in China should obey the identifiable principle so as to maintain the objectivity and authenticity, scrupulously abide by the ethics, ancient book conservation needs to confirm reasonable identifiable technology.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proved that Chinese ancient book conservation technology had identifiable function by summarizing identifiable characteristic and using the identifiable effect provided by the conservation case. [Result/conclusion] Chinese ancient book conservation technology complies with identifiable principle, integrates conservation and identifiable functions, and has favorable identifiability and conform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The application of identifiable technology should depend on the shape of ancient books and the purpose of their conservation, and the specific situation should be analyzed.

Keywords: ancient book conservation technologies of ancient book conservation identifiable principle identifiable technologies principle of ancient book conservation